

23707

西乡县文史资料

第二



8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西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7

目 录

- 回忆我任国民党二十二军驻延安联络处
主任的经过
.....张炳烈 (1)
- 三十年代司上农民两次反暴斗争的始末
.....祝儒哲 (10)
- 国民党统治时期西乡县政府编制演变
及其主要活动
.....马文卿 (17)
- 怀念孙丘园先生
.....方璋甫 (32)
- 解放前西乡青红帮活动及“西政部队”
的组成始末纪实
.....杨厚生 (51)
- 回忆西乡志愿兵团的始末
.....董钟嶽 刘泽民 (125)
- 解放前西乡县银行金融业务史浅谈
.....陈启昭 (136)
- 一九三二年西乡县发行“代征券”的经过
.....肖儒丞 (145)

解放前西乡县征兵情况及其流弊	张炳烈 (151)
三十年代初西乡兵情匪患简说	肖儒丞 (158)
我所知道大土匪王三春的一些情况	姚大业 (167)
昙花一现的西乡合作实验区	佃潮痕 (174)
原《大公报》在西乡经销纪实	郑大公 (187)
回忆我对军统特务的见闻	张威信 (200)
西乡钟鼓楼史话	杨厚生 (234)
质疑·补充·订正	
对《我参与办国民党西乡县党部和指委会 的经过》的补充	陈洁生 (238)
对《追念刘霞举先生》的补正	刘开荣 (240)

回忆我任国民党二十二军驻延安联络处

主任的经过

张 炳 烈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受命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部和八十六师师部两个单位驻延安联络办事处主任，在延安度过了一段难忘而有意义的岁月。兹就记忆所及追述于后，亦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革命圣地延安团结抗战中的一个片断。

一九三七年九月，抗战形势非常紧张，邓宝珊由甘肃天水调到陕北榆林坐镇，担任国民党晋、陕、绥、宁四省边区的抗日总指挥。我们八十六师驻榆林，也归邓宝珊指挥。八十六师师长是高双成，我在师部任上尉副官。当时绥远、张家口、太原均已失陷，内蒙古黄河以西的伊克昭盟各旗及陕北榆林、神木、府谷各县震惊，人心惶惶。榆林方面急需派人侦察内蒙包头等地的军情和战情，邓宝珊和高双成指名派我前去执行，并交待了具体任务：联络伊克昭盟及各旗蒙王，不使他们投降日寇；联络当时抗日较为坚决的抗日将领马占山及东北骑兵第二军

何柱国等部队，协同对日抗战；侦察日寇进攻动向。我受命后，带一副官和一位蒙语翻译及一排士兵由榆林出发，冒着生命危险，费了不少唇舌，几经反复曲折的斗争，终于完成任务。从而邓宝珊、高双成认为我还有点“本事”，对我有所器重，这大概就是我到延安去的契机。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我所在的八十六师奉命扩编为二十二军，高双成升任军长又兼八十六师师长。有一天，邓宝珊总指挥召见我谈话，对我前往内蒙的联络工作慰勉有嘉。并说，他已同高军长商妥，要我代表国民党二十二军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担任联络处主任。因为我们榆林的一切军用物资，都要由西安请领经过延安运送；而八路军在晋北抗战当中所得缴获，要由晋北的偏关渡黄河，经过府谷、神木、榆林，运往延安。所以双方需要互设联络处，以资随时解决双方运输及其它合作事宜。邓宝珊说：“我们已电请毛主席同意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派人常驻榆林，你常驻延安。你先作些准备，待八路军代表一到，你就可以成行。另外，你在延安驻留期间，对国民党中央方面不要声张。如有其他友军问起，就说是八十六师处理运输事宜的人员。处事要特别谨慎，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接着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略加考

虑，就乘机要求：办事处人员须由我挑选，不能让那些染有不良习气的人员跟我去延安，并推荐原来在榆林中学教书、后因领导学潮宣传抗日救国而被国民党肃反委员会逮捕、又被我救出来的北大毕业生阎方昕，担任我的秘书。因为我考虑自己乃一粗鲁无知的“丘八”，不知道应该怎样同共产党大人物打交道，阎方昕是知识分子，又是左派，我去延安联络处工作，需要他这样的人，故坚请军部任命阎为我的秘书。邓总指挥和高军长都答应了我的请求，还破格提拔阎方昕担任联络处中校秘书。由于工作需要，提升我为少校。正是因为阎的帮助，我在延安的工作一直是很顺利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派刘参谋一行数人到了榆林，由我接待并陪同刘参谋拜见邓总指挥和高军长，并在军部设宴欢迎。第二天，我给刘参谋等人找了房屋，挂上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驻榆林联络处”的牌子。三月二十日，我们军部发表我担任二十二军暨八十六师驻延安联络处主任的命令，由刘参谋电告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将军。

三月二十七日，我带领办事处人员到了延安，拜见了肖劲光将军，受到肖司令员的热情接待，暂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内。当即呈递了邓宝珊和

高双成分别写给毛主席的信，请他代为转呈。

第二天，肖司令员带我和阎秘书去晋谒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当时住在凤凰山麓，我们从延安北关的留守兵团司令部出发，经过抗日军政大学，走不远就到了毛主席住处。肖司令员作了介绍。毛主席第一句话就问我：“听说你在伊克昭盟跌伤了腿，现在好了吗？”我赶紧起立回答：“全好了。”毛主席说：“快坐下！今后我们要常见面的，要随便些，不要客气。”刚开始我的心情比较紧张，但听到毛主席和蔼亲切的话语，顿使我感到无比温暖，态度就比较自然了。毛主席对八十六师敢于同日寇奋勇作战，大加慰勉；谈到国共合作与全民抗战，他强调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我恳请毛主席随时给我军以指示，以资我军在抗日作战中有所遵循。谈话约十分钟，我便告辞。拜谒朱总司令约二十分钟。朱总司令穿着普通棉布军装，有几处还打了补丁，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在他那里我一点拘束心理也没有了。第三天，我同秘书在八路军一位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又分别拜见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刘景范、秘书长曹力如等。此后我在延安工作时期接触最多的便是肖劲光司令员和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八路军留守司令部重新给我们找了一处办公地址，我们联络处就从留守兵团司令部里搬出来了。联络处新址在延安东街中央礼堂即鲁迅艺术学院的对面，八路军后方医院门诊部的后院，后门外就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本部。四月二十日。邓总指挥派车把我的妻子陈哲民及一子一女送到延安。从此，我们全家就在延安开始了一段难忘的新生活。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主席都要给抗大、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学生做报告，我和妻子以及秘书常去听讲，受到了不少教益，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祖国的胜利前途。有时大礼堂开晚会，我和家属及办事处人员都去观看。八路军方面对我们非常客气友好，亲如家人。我也时常告诫下属，要切实遵守八路军的各项规矩，绝不能惹事生非。我妻子是江西人，在延安生活不习惯，不吃面食。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让肖司令员专门给我送了一麻袋大米。逢年过节，毛主席请客赐宴，由他的秘书李九如先生作陪，毛主席还前来劝酒。这些恩情，我久久萦怀难忘。我时常后悔，当时一时固执，相信“忠君爱国”、“一臣不事二主”那一套封建教条，未能在后来被国民党撤职查办时，听从肖司令员和阎秘书的告诫而毅然加入八路军。结果几乎被国民党方面杀害。真是

糊涂！

我在延安见到各界民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来到延安，在抗大经过短期学习，便奔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生活虽是艰苦，但官兵平等，民主空气很浓，人人精神抖擞，朝气蓬勃。文化宣传工作非常出色，到处张贴着抗战墙报，剧团、文工团经常演出自编的戏剧，内容新颖，鼓动性强。每当文艺晚会，我一家还被安排在前边就座。开演之前，常是各个团体互相拉歌子，呼喊声和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我的孩子克强年方七岁，有时也在开演前跑上舞台手舞足蹈地乱唱一气，把人笑得前仰后合。这些情景，直到如今还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初到延安也曾闹出过一些误会。有一次我同家人出去郊游，我的勤务兵朱作产开枪打鸟，附近村子的民兵听见枪声立即赶来包围了我们，把我们“抓”进村里。老百姓误认为我们是汉奸，纷纷喊打。经过我们反复解释，又同边区政府取了联系，才解除误会。这实际是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以后行动就谨慎了。

当时我在延安的主要工作是办理运输，一方面是办理我军的运输，另一方面也替八路军代办。榆林国民党军的粮饷、武器、弹药、被服等军用物

资，都由二十二军汽车队从西安取道延安运往榆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往返延安的人员和一些医药及其它物资，也常由我们的运输队代运。我们的军运汽车每次经过延安，都要在联络处存放物品和住宿。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们二十二军拨归国民党第二战区由阎锡山指挥，因而我军的武器粮秣转由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供给。其时第二战区的后勤仓库驻在洛川，所以二十二军又在洛川设立一个临时办事处，由我兼任主任。自此，我常奔走于榆林、延安、洛川、西安之间办理领运军用物资的事务。九月间，敌机反复轰炸延安，我军联络处被炸毁，就迁往杜甫川的皮家圪塔。以后我们在杜甫川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约二公里长，供我军汽车队往来存放物资之用。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常有物资运往延安，途中常被胡宗南设在三原、耀县等地的盘查站扣留，多方刁难，制造摩擦。肖劲光司令员请我暗中同邓宝珊总指挥、高双成军长及二十二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王觉先商妥，对于八路军急需的物资，如五金原料、电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用二十二军名义代为购置、运输，到延安后交给八路军留守司令部接收。

十月，坐镇榆林的邓宝珊总指挥，改称“晋陕

绥宁四省边区抗日总司令”。不久，高双成病故，由旅长左协中升任二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由于二十二军同延安八路军之间关系密切，后来我每次去洛川请领军用物资时，总是困难万状，受到许多刁难。有一次，肖劲光司令员请我吃饭，同桌还有一位叫张中阳的，是阎锡山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以后我们便时常来往，无话不谈。一次，张中阳见我有一支德国造的小左轮手枪，就反复赏玩，赞不绝口。我投其所好便把这手枪送给了他，并乘机请他帮忙在洛川方面疏通，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张中阳同我一一道去洛川，由我设宴请客，张中阳作陪，请第二战区驻洛川的后勤部各仓库主官赴宴。宴会上，张中阳替我着实地吹嘘了一番。晚上又向我点明各主官的不同嗜好，要我“对症下药”，各送一封厚礼，其中有不少是鸦片。从此以后，我去办事就特别顺利了，每次随到随领，迅速简便，大米、面粉都是新鲜的，被服军装的质料都是上好的。真是钱能通神！从这里也可看出国民党腐败之一斑！

一九三八年底，我们联络处秘书阎方昕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去湖南武岗工作。这时我才知道他原先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临别时我们都依依不舍，他再三劝我不如意时投奔八路军，并说这也是肖劲光

司令员要他转告给我的话语，等等。他到武岗后改名阎丁南，我们还通过两次信，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后就失去了联系。我至今仍非常怀念阎君。他不但是我在延安工作期间的好助手，也是我的一位好先生。

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因父亲病故，请假回西乡奔丧。八月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时，西安二十二军办事处主任王觉先转给我一个“撤职查办”的命令，其原因说我与共党私通。我怕“查办”，便脱离了二十二军的军籍，携家在西安闲住。半年后，因生活无着，才又经李纪才介绍到国民党陕南师管区司令部担任副官。

我今年已八十三岁，本一无知莽汉，回溯解放前无政治远见，是非不分，以人生“逛荡”为快，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鬼混了三十多年，其间虽任国民党二十二军驻延安联络处主任一年又四月，身处革命圣地，本应受到革命熏陶，走向正路，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但思想守旧，失去良机；继续在国民党里求食混事，直到解放。暮年思昔，深感痛悔！

三十年代司上农民两次反暴 斗争的始末

祝 儒 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途经西乡并胜利入川后，国民党反动派仍以“防共重来”为由，驻扎重兵，继续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强化地方反动势力，供其驱使。

那时西乡县商会会长、大恶霸孟显庭（解放后镇压），在司上占有大量土地，包括“耳山”在内，不下六、七百亩，客庄户十多个，莫不受尽剥削。孟显庭用拉拢行贿的手段，给他住在司上的儿子孟子显搞了个“联保主任”。孟子显与其妻高珍英依仗父势，狐假虎威，把持乡政，胡作非为。他们笼络了两个湖北老乡陶某某、樊在元作为亲信爪牙，横行乡里，鱼肉人民长达四年之久，农民积恨尤深。

一九三六年，陶某某任司上联保处队附，负责罗镇、司上、杨家河三乡的壮丁训练，是孟的得力爪牙，他们狼狈为奸，经常任意毒打、侮辱和剥削压榨队丁与农民。甚至连队丁的粮饷也私吞不发，让队

丁都从家里拿米来吃。平时还要强迫队丁给他们家里服无偿的劳役，因而队丁和农民都恨之入骨。由于不堪压迫，队丁罗明义、罗明贤、陈金裕、胡加兴、席发润与农民罗明金、罗明兴、赵青云等十余人密谋开展反暴斗争，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晚上，聚集了队丁和农民三十余人，偷袭司上联保处，首先击毙了孟子显高珍英夫妇，又杀掉其爪牙陶队附。接着赵青云等即把联保处的十余支枪全部缴械，把队伍拉在东岳庙内，准备与反动政府对抗到底。第二天很多农民也纷纷响应，暴动队伍增至一百余人。

孟显庭因司上农民杀了他的儿子、儿媳，气急败坏，到处活动，要剿杀农民报仇。不几天，国民党县政府派民政科长杨树崑带领袁刚一个中队到司上以武力威胁，并向暴动者诱骗说：“孟子显等人亏待队丁，死是应当的。农民只要安心回家生产，队丁只要携械回来，一律不咎既往；队丁仍各任原职。”结果暴动队伍受骗，一部分回家，一部分队丁携械返回联保处。不久反动统治者就采取阴谋手段，以各种借口，把暴动队丁的骨干，阴一个，阳一个地杀掉了。这次暴动斗争就这样失败。

自这次以队丁为主的农民反暴斗争失败以后，统治者强加给农民的苛捐杂税及兵差伕役更加繁重

残酷，司上农民以第一次反暴斗争失败的余恨又强烈起来。一九三七年八月，罗明金、王老二、杨成明、罗明义等八九个农民，以拈香会（结拜弟兄）的名义密谋组织“神团”，待机反抗。不幸此事被联保处知晓，即将罗明金叫去追问，罗以纯系结拜弟兄，互帮互助，并无其他图谋之言回答之。敌人问不出什么名堂，却又不放罗回家。于是罗的结拜弟兄王老二、杨成明、罗明义等八人在愤怒之下，一面暗地里积极筹划，采取行动，一面托人说情，营救罗明金。后来当他们得知联保主任张绪堂、队附李禄田要把罗明金同拉的农民一道送往县城当兵的消息时，他们就从司上往县城的路上天天等候劫救。九月十四日，果然由联保处将二十余名穷苦农民绳捆索绑，充作新兵送往县城。途经穿洞子附近，王老二、杨成明、罗明义等率领农民十余人，英勇拦截，打伤了押解队丁，解救了罗明金和其他农民，捆绑了押送农民的班长。并立即返回司上，出其不意地夺去了联保处的十余支步枪。当日司上正逢集，人很多，他们就借机控制了街道两头的要道，讲述反动政府压迫农民的罪行，动员人民参加“神团”，反对派粮派款，取消苛捐杂税，拒服兵伕差役等。赶场的人听到这些有利于己的宣传，当天报名参加的就有四五百人。不久，这些人先后集

中，驻扎在东岳庙。当时较开明的原联保主任王玉亭、绅士邓达生等，迫于形势，也带了一部份人参加“神团”。“神团”人数增多后，为了巩固“神团”力量，加强其组织性，接着就进行编队。全体“神团”人员共编为一个营，三个连，连以下编制的有排和班。营长由罗明金担任（人们按神团又把他称为团长），总指挥由罗光华担任，参谋、副参谋分别由王玉亭、邓达生担任；连长由宋日平（后升为副营长）、杨成明、周百升、周成西等分别担任；排长由罗明义、周宇杰、陈安晓、赵贵显等人分别担任。王老二、罗家兴、王国顺是神团“脚马”，专门负责“炼水”、“画符”、“排刀”（即训练刀矛功夫）。蒲明贵担任文书。“神团”编制就绪以后，为方便食宿，协防御敌，便分驻在东岳庙、三化山、坪上、清分寺等地。“神团”正式提出了“打匪灭款，反对不合理的兵伕役制度”的口号，作为宗旨，宣传于群众，以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神团”吃的粮食和费用都是指令地主、土豪劣绅供给。对农民利益毫不侵犯，过往客商一律受到保护。对一些平时豪强霸道的土豪、差人和狗腿子给予了镇压。杨家河何乡约夫妇及儿子何保长，差人李顺协、王春池等，都是因平时豪恶霸道而被“神团”杀掉的。

“神团”力量壮大起来后，反动政府担惊受

怕，恐慌不安。是年十月初，县政府即派县常备队中队长杨子祥率领一个中队，并调杨河坝民团朱存新（人称朱团）带领六十余人前来镇压。他们分驻在道鱼口，东岳庙。“神团”侦知其情况，作了严密部署，集中优势从三化山方向突袭猛攻，杨子祥中队和“朱团”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常备队死二人，伤十余人。“神团”缴获步枪十余支。“神团”打了这一次大胜仗以后，声势更大，参加“神团”的人员增至八百余人。

“神团”活动震惊了邻县反动势力，十月中旬，镇巴县保安队长黄一甲率镇巴保安队，借守镇巴边境为名，在杨家河与司上一带进行骚扰。“神团”为了保境安民，派二百余人予以征伐。结果保安队凭地势优越进行顽抗，“神团”伤亡四、五人，战败返回。但“神团”并不气馁，接着又组织了大批部队，配了一门“牛耳土炮”，前往讨伐。黄一甲量力不及，怕吃亏，便率部逃遁。

“神团”建立时有些仓猝，大部分成员参加时又无思想基础，加之训练无素，生活没保证，组织纪律又不健全，这样“神团”本身就很难巩固。尤其是自与黄一甲保安队激战以后，死伤忧惧，又影响了大部分成员的思想情绪，于是跑的跑，散的散，仅剩一百多人了。